

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 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

王崑義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客座教授)

蔡裕明

(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全球化的到來同時也促成了風險的全球化。一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顛覆了全球樂觀主義與傳統所謂的國家安全觀，SARS的出現凸顯主流的社群開始關切人類的安全問題。本文從SARS所引發對人類安全的關注著手，思辨兩岸在「後 SARS 時代」的新安全關係。就臺灣而言，SARS是來自於邊界外的安全威脅；就中國大陸而言，SARS是屬於境內的安全挑戰，使得兩岸形成不同的防疫策略，從而建構各自對於非傳統威脅的論述。本文以為，以人類安全做為全球化拓展的基礎，建構一種以人為主體的「理想的言說情境」，或可找尋出兩岸關係的可能解決之道。

關鍵詞：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人類安全、兩岸關係、邊界與邊疆、全球化

壹、前言

2003年春天，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並向外擴散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它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恐懼、憂慮與失序的情景雖然來去匆匆，但在兩岸之間因病毒侵襲所產生的安全焦慮，卻讓安全的思考有從過去的傳統安全領域，擴展到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現象。

過去，傳統安全領域為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安全焦慮，大都集中在國家生存的想像上，它所涉及的安全議題包括軍事力量的威脅、武器的使用和控制方面，每個國家為了達到生存的目的，無不積極的追求武器的增長與更新，軍備競賽於是成了國家追求安全思考的主軸。然而，伴隨著資源、環境、人口與疾病擴散等社會、經濟問題日益尖銳化，以人為主軸的非傳統安全領域，也逐漸被納入國家安全的思考中。¹

當然，安全研究從傳統安全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擴延的現象，過去全球樂觀主義者就已先行提出，他們普遍認為以全球化現象做為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展的新階段，各地域的活動已經超越民族 - 國家在地理

1. 請見<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9/02/content_1058241.htm>，以及陸忠偉主編，《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頁9-95。另外，作者認為如果比較「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差異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

- (1)主體不同 - 傳統安全的主體是國家，而非傳統安全的主體是個人與公眾。
- (2)內容不同 - 傳統安全重視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非傳統安全不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而是對人的生命所進行的關注。
- (3)範圍不同 - 傳統安全是從外界對內部的威脅；非傳統安全則是內部自發的威脅。
- (4)手段不同 - 傳統安全是以軍事作為追求安全的手段；非傳統安全的理念是以政治、經濟為追求安全的手段，並突出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上的國界(border line)，逐漸往全球方向延展，國家的「邊疆」(frontier)也有從疆界往外延伸的景象，這就形成晚近談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基調之一。在許多全球樂觀主義論者當中，他們就認為全球化已經逐步的將全球整合成為一個單一的結構，國家將無法再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

這些全球樂觀主義論者，以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為例，他在 1995 年所出版的《民族國家的終結：地區經濟的興起》一書中，就曾提出：「在四個“T”(工業、投資、資訊和個人)的作用下世界正走向一個無邊界(borderless)的時代。這個結果，傳統的民族國家已經成為當今全球經濟中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經濟單位。」²大前研一以「市場中心主義」的觀念提前宣布「民族國家的終結」，雖然並沒有在全球出現，但卻說出了當前世界在全球化的擴展過程中，「國家」面臨職能逐漸被萎縮時，可能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產生一種新的安全焦慮。

另外，也有一些原先堅持傳統國家安全觀的論者，他們認為由於當前國與國之間，透過綿延不斷的資訊技術與通訊的傳遞，不但開啟了全球化的領域，特別是蘇聯集團的崩潰與美國在 1991 年輕取伊拉克之後，人們想像全球共同安全的時代已經來臨，各種衝突可以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或者說可以透過危機管理，避免衝突升高成為戰爭。更由於全球化的過程把全世界接合在一起，透過全球與區域性的經貿往來，國家撤除地理上的疆界，並以它們在全球所占有的資本比例，重新評估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融合的程度，進而揭開了全球化時代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內涵的新安全觀序幕。這也使得他們改變了傳統國家安全觀，逐漸把非傳統安全領域納入國家安全的思考中。³

2.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 Econom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5.

3. 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然而，不管是全球樂觀主義者或傳統國家安全觀的論者，他們並沒有放棄從國家角色來思考問題，使得安全領域的研究，仍然存在只有國家而沒有個人的現象。畢竟，做為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核心的概念就是國家(nation state)，從國家的概念往外延展就是區域安全(regional security)、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與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向內則包括了諸如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環保安全、能源安全或犯罪問題等。⁴傳統上對國家安全的思考，大部分還是集中在外部性的安全議題。而SARS的出現，可以讓主流的社群，開始從內部性的安全議題，關切以往被忽略有關人的安全問題。

相對的，把人作為安全的主軸，也可凸顯傳統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被後現代理論產生批判性質疑的一部分。因為後現代理論的提出，是對於再現理論和把理論當成現實的鏡像反應所進行的一種現代性批判，轉而採取「視角主義」(perspective)或「相對主義」(relativism)的觀點，認為理論充其量只不過是提供關於對象的局部性觀點，而且有關於世界的認識性再現，都是受到歷史與語言的中介影響。⁵所以，「人類安全」的意涵，可以補充傳統上對安全認知不足的部分。「人類安全」的提出也讓人們重新思考有關安全的底蘊、界定何者是人類安全的挑戰、人類安全將如何在非傳統安全概念中進行顛覆？以及如何更有效率的整合既有資源。

對兩岸來說，透過SARS產生的議題，既讓兩岸關係產生一種「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現象，也隱然重構了兩岸的新安全關係。畢竟，兩岸各自受到歷史情結的影響，彼此常用設計過的語言來攻訐對

年)，頁18-19。

4. 莫大華，〈安全研究論戰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8期，1998年8月，頁19-20。

5. S. Best and D. Kellner 著，張志斌譯，《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Post-modern Theory*)》(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5。

方，使得雙方都不曾跳脫對峙的邏輯。在各種「語言 - 行動」的對峙安全觀之中，過去以來它反映傳統上國家以軍事設計所產生的交往形態，從而形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現象。然而 SARS 的出現與暫時的結束，讓兩岸認識到單以個別政府的力量，並無法防堵跨越國境傳染病的蔓延，為了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國家反而必須以延伸「疆界」的方式來避免非傳統威脅。因此，如何建構在非傳統安全的視角下，尋求可能的合作關係，變成是維護兩岸人民生命安全的新議題。

本文即從 SARS 所引發對於人類安全的關注著手，思考兩岸之間在「後 SARS 時代」的新安全關係，並陳述對於未來兩岸關係可能採用新的交往關係的一些看法。

貳、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的關連

全球化不單是經濟的現象，更是象徵政治、文化、軍事與環境的多元結構體。全球化主要是以垂直與水平兩個層次作用於國家體系。在水平的層次上，全球化的意義在於突破國家地理上的主權疆界，讓國家逐漸融入全球體系中，並共同參與全球體系中的各項事務，國家也必然承擔全球一致的風險；而在垂直的層次上，全球化打破國家與社會的上對下的統治模式，國家修正過去的統治概念，改採治理(governance)的思維來重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從而強化國家的行政力量來達到國家內部綏靖的目的；而且也從以往重視國家安全的威脅，轉而重視人本身的價值與尊嚴。

在另一方面，透過全球化所建構的「全球政治」，也可以有效的穿越時空的政治關係，亦即政治權力與政治活動，將跨越現代主權國家疆界而不斷的對外擴張。於是，「全球政治」的概念，將挑戰國內 / 國外、對內 / 對外、領土 / 非領土等傳統的概念所畫分的政治形態，它同時強調在全球秩序中橫跨國家與社會的密集與複雜的聯繫程度。⁶

在圖1當中即表示了國家地理邊界內部國家、社會、個人與全球體系之間的參考架構。現今藉由網路科技的發達，業已改變國家／社會／個人與國家／全球體系，乃至於個人／全球體系的垂直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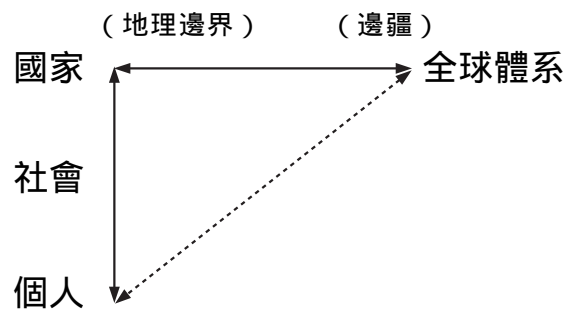


圖1 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全球體系的變動關係

* 本圖是由作者自製，圖的表述是指國家地理疆界內的垂直關係，與地理疆界外的全球體系的聯繫關係。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家內部從國家、社會到個人，均無法擺脫全球體系的影響，使得國家難以再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來思考安全的問題。

一、全球化與安全的意涵和特質

全球化對於安全領域的意義，在於打破以往對於安全的傳統概念，SARS的出現，更凸顯對於傳統安全思考的盲點。現今做為全球化的基本特徵，就是資本主義體制將全球打造成為單一的市場，使得各個國家的安全議題變成了全球公民社會的議題，各個國家片面性與局限性的政策產出變成了不可能，於是許多地域和國家的安全議題，就不能擺脫全球性的範疇來進行思考。

6. David Held 等著，沈宗瑞等譯，《全球化大轉變 - 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臺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1年），頁62。

就因全球化所產生地理終結的擴大效果，使得各個區域均難以跳脫全球化對它的影響。以往對於全球化的思辨，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本身，另外則是關於「本土化」意識的崛起。⁷這兩種價值觀的討論，若從地理的視角來講，就是關注於「疆界」以內的問題，還是疆界以外的「邊疆」問題。「邊界」以內與「邊疆」這兩個地理範圍上不同的區位，也影響到兩個不同安全意義之意涵，也就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兩個領域。

就第一種安全意義而言，全球化是關切「疆界」以內的安全問題，也就是對於本土安全的關切。它是從疆界以外的威脅著手，進而思考管理疆界內部的安全議題。這套把國家作為傳統安全的思考架構，主要是思考地理上疆界的內部安全問題，以及在疆界之內現代性的認同和外部性傳統的軍事威脅。而第二種意義則是相反的認為，全球化所關切的安全議題，應走出國家地理上的疆界，把焦點放在國家疆界之外的邊疆地區。在這個意義之上，安全也被視為向外拓展的過程，這套超越國家地理疆界的思考架構，呈現出非傳統安全的思維，也就是關切地理上所謂邊疆的問題、建構跨越疆界的認同以及因應非傳統威脅的內部防衛。

事實上，前者對於安全本身的論證，大多站在傳統安全的基礎之上，認為未來的威脅將以國家為基礎，國家的行政力量主要是在處理外部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這是全球性軍事秩序的一種展現與運動的表徵。它主要表現為，在全球性軍事秩序的制度性向度之下，它呈現出超級大國的霸權、武器交易及軍事聯盟體系，⁸這三種不同的現象超越了一國的範圍，而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軍事關係接合在一起。

7. 王崑義，《全球化與臺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臺北：創世文化，2001年），頁29-34。

8.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2年），頁266。

這一結果就全球領域來看，它是在國際軍事秩序當中產生思想與軍事對峙的連鎖效應，允許國家之間在軍事技術方面的合作與發展潛在的對抗行為。軍事技術的擴散將我們處於「軍事社會」當中，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水準越高，它的行政體系就越統一，軍事生產將表示不能超越其他部門，直接的軍事統治就難以持久。⁹但是傳統安全的思維卻將工業主義與國家體系結合，其軍事力量超過以往的帝國對外擴張的戰略。

然而，「超越邊界」的論述則從非傳統安全來加以解釋，其中包括了資源、環境、人口與疾病等社會、經濟問題對安全領域的影響。因此，全球化的意義，就呈現了風險與威脅的跨越邊界的效果。

因此，在這兩種意義之下，全球化下的安全意義就產生了典範的轉移，安全本身既包含了國家邊界之內的範疇，也包含了國家邊界之外的內容，更包含全球與本土的建構關係，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與互補的作用。

即以「911事件」之後為例，這個事件讓全球化樂觀主義的思潮儼然破局，原本推動資本主義體制的自由思想，被迫對國家安全妥協，開始出現所謂「堡壘國家」(fortress nation-state)的現象。例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成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加強對美國機場與港口的監督，也對外國人進行嚴密的監控，這些都已經破壞原本美國所服膺的自由人權的思想。他們也要求鄰近的國家採行相類似的管制政策，並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推動「集裝箱安全倡議」(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CSI)，逐漸讓美國本身形成「壁壘美國」的架構。¹⁰美國新保守思潮的回潮，也對其他國家產生了示範性效果，為了防範外部不確定性的威脅，各國於是開

9.同註8，頁265。

10.嚴震，911改變了美國固有價值，《中國時報》，2003年9月11日，版15。

始將安全的防範從國家的邊界往外延伸。

另外，在全球化的趨勢當中，另有一項值得探究的就是社群(community)概念的再現。晚近社群的概念是伴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性而起，經由網際網路，人們可以透過「虛擬社群」(The Virtual Community)來找出現實生活的出路，¹¹同時也可以藉由「虛擬社群」來形成多元文化與建構身分的認同。¹²當國家地理邊界內部的人民，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共同與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互動、分享想法與資訊時，其實已經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原本社群的概念，所指涉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存在著某種連帶的關係，這種連帶的關係可以是以親族、宗教、政治權力、革命或種族為基礎。在現今所處の後現代社會當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時透過資訊符號進行傳遞，進而形成一種「想像的社群」。這種「想像的社群」的最大特徵，彼此之間往往未曾謀面，可能超越國家地理上的疆界，進而造就真正的全球化虛擬社群的出現。¹³

相對的，在全球化與安全概念的拓展之中，開始觸及到以往安全論述較少提及的人類安全。於是，國家、社會、人類以及全球體系、安全的概念，就可以有如圖 2 的現象產生。這四個方面其實是相互聯繫，本文以下說明我們的看法。

11.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93), p.5.

12. Tim Jordan,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179.

13. 蔡裕明，「資訊性民族主義 - Linux 對中國大陸的意義」，《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12 期，2001 年，頁 21-36；蔡裕明，「想像的 Open Source 社群 - Linux 在臺灣的發展經驗評述」，論文發表於 2003 年「臺灣的社區與組織」研討會，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主辦，2003 年 11 月 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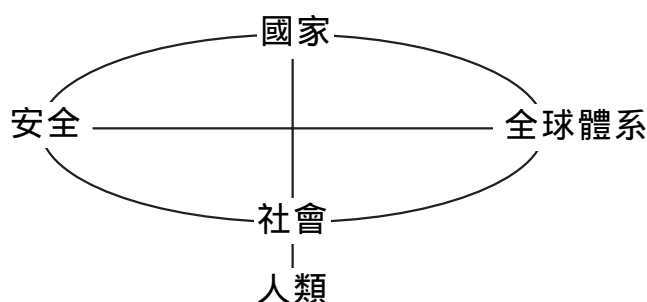


圖 2 安全與國家、全球體系的關連性

* 本圖由作者自製，圖的表述是指在全球化時代，安全的議題既是由國家外部而來，也是從國家內部而起，所以國家在思考安全的問題，無法再由疆界的畫分來著手。

二、人類安全的意涵與特質

就傳統上而言，「安全」多被視為新現實主義的語彙，它所指涉的是保護領土上的完整性以及國家的政治主權。這樣的界定方式主要是由於政治權威的需要或學者研究上的便利而來，其所關切的焦點則是在國家疆界(border line)之內所面臨的威脅，由於晚進對於人類發展的概念以及在全球化的雙重推動之下，安全研究者開始認識到傳統安全的概念有其不足之處。

就最低的限度而言，國家的安全是依賴於國內的公民覺得安全或不受到威脅的情境，這是一個自明之理。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某個國家內部政治的不穩定很容易成為超越國家疆界的問題，威脅到國家的、區域的乃至於國際的安全問題。也就是說，可以將「安全」予以概念化與精緻化，將焦點放在個人或社群的意義之中，也就是本文以下所要談論的「人類安全」。「人類安全」的意義基本架設的重點在於：我們今天所談論的任何議題、風險與需求，都與整個地球上所生存的人類息息相關。例如貧窮、病毒的傳播、環境汙染、人口壓力或

經濟危機等，這類全球性的議題終究會影響到個人的生存與發展。

現今對於「人類安全」的關注，大概反映了三個趨勢。第一，在全球化時代下科學與技術的發展，讓人類有足夠的知識與方式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如疾病的治療、人的溫飽、提供人們基本的庇護或是教育群眾等，也就是說它的目的在於照顧整個人類的生命。第二，可以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或其他的傳遞訊息的工具，立即的了解遠方世界所發生事件，明瞭遠方世界的人們所受到的影響。¹⁴ 第三，從公民的觀點來看，人類安全才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價值，也是維護個人安全的重要路徑。

事實上，1994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首先提出「人類安全」的基本概念。在這個報告中「人類發展」是個廣泛的概念，包含拓展人類選擇的範疇。「人類安全」所指涉的是人類選擇的自由與安全，而且確信今天所擁有的機會，到明天的時候不會失去。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新的全球安全議題逐漸浮出檯面，而1994年關於人類安全的概念架構依然可以適用於今日的分析。

同樣的，在1994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當中，也明確的界定了人類安全的意涵。其中提及了人類安全包含了：經濟安全（基本收入的保障）、糧食安全（基本的溫飽）、健康安全、環境安全、個人安全、社群安全(community security)與政治安全（基本人權與自由的保障）等七大主軸。¹⁵ 總體來說，人類安全所關注的是兩個主要的面向，一個是免於威脅的平安；這類的威脅有饑餓、疾病與國家的武力鎮壓。另一個是保護人類免於突發或是有害的意外事件。

14. "Human Security: A Conversation," *Social Research*, Vol.69, No.3, Fall 2002, pp.659-661.

1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http://www.undp.org/hdro/hdrs/1994/english/94.htm>>, Chapter 2.

人類安全的核心概念在於主張個人安全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每個人的生存與基本自由沒有受到威脅時，社會才能安全，國家也才能安全，連帶著整個國際社會才能獲得安全。這種觀念和國際關係學界主張，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以來，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分析邏輯迥異。¹⁶但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下，人的主體性受到扭曲，在國家概念的宰制之下，社會一直在進行著一場不平等的複製，人應具備的主體性反而被物化。

在未來的發展上，人類安全的思路旨在建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世界，關切人類如何生存、如何選擇他們所企求的生活方式，如何在競爭、衝突與合作的環境中進行互動與互助，這些必然是人類追求美好生活時所必須面對的事務。在「人類安全」的概念下，地球村將成為一個命運的想像共同體。不管是戰爭或疫情，每個國家或是每個人，將越來越難以置身事外。而唯有透過真誠的合作，才是人類面對不確定未來的最佳選擇。

三、後 SARS 時代的定位

在中國大陸所稱的「非典型肺炎」(SARS)並不是一種疾病名稱，而是泛指相對於傳統肺炎的其他肺炎，因其致病原、病徵、治療方式不同，而被歸類為「非典型肺炎」。而先前爆發的肺炎的癥結在於，還是無法確實斷定其病原為何。¹⁷也就是說，「非典型肺炎」就是一種未知的病毒、未知的威脅，以及不同於以往流行病的處理邏輯。

只是，藉由一個未知的病毒來劃分歷史時期，本質上只能是以某

16. 林碧炤，〈全球化與人類安全〉，論文發表於「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2001年9月14日，頁14。

17. 積極因應這波全球防疫的反恐戰爭，〈中國時報〉，2003年3月18日，版2。

種變化的程度為標誌。因此，在一個時代結束之後使用一個「後」字，表面上指涉著一種階段化，一個時代的劃分方式，因為人們無法理解未來的時代具有什麼樣的特質，於是就把前時代的名稱冠上一個「後」字，如後冷戰、後 911、後現代等名稱。當然，這樣一個劃分的方式，反過來是可以產生解釋新時代基本的體制變動、歷史的發展趨勢，以及對新時代所需具備的普遍性知識等，有了這些基本的知識，才能逐步建構出新時代所具有的特性。¹⁸

然而，使用「後」字來指稱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本質上還有它不同的意義，例如「後冷戰時代」是指「冷戰時代」的結束，而「後 SARS 時代」則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這之間，如果是指稱前時代的結束，那是一種連續性的關係，當然「時代的連續性」是指兩個時代既有相同的行為模式，也有創新的思考方式，只是在思考和作為上有別於前時代，但仍可參考前時代的作為。相對的，如果是指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那是一種「斷裂性」，也就是它跟以往的行為模式並不必然相關，更沒有任何參考的行為模式可遵循，必須在全新的領域中重新摸索。而「後 SARS 時代」就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必須由人重新去思考與探索新的經驗行為的時代。

這就類似過去知識界習慣於把「現代」與「後現代」兩個概念，區分為整合與分離、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向心與離心、連續性與斷裂性、總體化與碎片化等兩相對立的經驗組合。因此，如果「現代性」被視為是一個理性的時代，那麼「後現代」就是一個顛覆理性的時代。所以，當在思辨 21 世紀「安全」的真諦時，不同於以往從國家的角度來觀察安全的威脅與挑戰，更須結合非傳統的安全觀，以社會(society)和 / 或個人(individual)為重心之多元主義為其參考架構。¹⁹ 並

18. Charles J. Fox, Hugh T. Miller 著，楚豔紅等譯，《後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43。

19. 張中勇，傳統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區別，載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研

從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視角來看待 SARS 的意義，就能凸顯社群(community)在「後 SARS 時代」所呈現的價值。

鑑於以上的解釋，在「後 SARS 時代」，對於當今世界政治與安全理論的研究，需要有三個研究綱領來進行整合，也就是解構、對話與重構。

(一)解構：結構的概念，它提供了社會科學解釋原本被忽略的一部分。例如，本文所討論的安全就是其中之一。²⁰解構也使原本主導性的語言或定義受到質疑，解構所提供理解的方法是：我們必須把原本所熟悉的部分去除，重新審視我們原本所具備的觀念。同時也是說，每個人的看法或意見，只是多元政治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先承認，意見的多元化可以擴大我們的視野。²¹

(二)對話：對話的目的是為了對社會現實的多元理解，對話所設定的目標是沒有固定答案、開放、沒有固定的程序、不存在特定權威的觀點。使得對話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種理解的方法。然後，可以用更好、創新的方式闡述或重構安全的意義。²²

(三)重新闡述或重構：重新闡述或重構就是把安全的概念，置於人

究報告》(臺北：國家安全叢書，2002年)，頁5-6。

20. 以往對於安全的認識，多是著重於國家安全，也就是強調「主權國家的安全」為優先的研究範疇，所反應的意義是世界上的政治組織，是有主權國家的身分所展現，從法律或就政治上來講，世界依照地理上的疆界將全世界區分多個不同的主權國家，也又是說，如果有一種政治單位需要被保護，這個政治單位便是國家。所謂的安全，根據字面上的定義，就是免於恐懼、憂慮與危險的感覺或是狀態，安全還有兩個範疇，一個是把安全當作是實體的狀態，一個是把安全當作是精神意識的狀態。而傳統的國家安全觀是把安全視為實體的狀態。請見 Donald M. Snow,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Policy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22-24。

21. 鄭祥福，《後現代政治意識》(臺北：揚智文化公司，1996年)，頁37。

22. 同註21，頁38。

類自覺創造歷史與進化語境的過程當中。把傳統所談論的安全主體予以邊緣化，將國家融入整個世界政治的關係當中，使其原先做為主體的理解方式消融，讓國家與國家之間成為互相的主體關係。²³

透過上述三個研究綱領來檢視「後 SARS 時代」，對於兩岸之間就呈現出不同的安全意義。在臺灣方面，它是一種來自於邊界以外的安全威脅，最佳的戰略則是將病毒阻擋在邊界之外。而在中國大陸方面，SARS 是一種來自於疆界內部的安全威脅，其戰略變成是防止病毒從城市擴散到鄉村。兩種不同意義的安全威脅，衝擊到各自的處理戰略，以及 SARS 結束之後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

在這種不同的認知之下，「後 SARS 時代」雖然是一個未知的時代，但它所凸顯的意義在於，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離開全球環境來強調自我的安全，各個國家一方面發展自己所特有的路徑，又不斷形成相互的歧異。另一方面，又不斷在國際的交往當中，產生了互賴或依賴的關係。使得 SARS 的出現，修正了以國家為主題的安全界定，反而透過對於 SARS 的理解與反思，可以開展以人為主題的安全意涵。

從現實面來思考，長久以來中共對社會與個人的統治方式，是透過行政命令與政治運動，從上到下的階層式統治模式。在國家對外的意義上，選擇透過發展軍事力量達成與其他國家交往的背後基礎。這樣的選擇，中共可以發展「後殖民」的論述，以國家安全的理由來表述正在形成的全球軍事秩序，已經威脅到傳統中國的邊界，特別是以美國為主的勢力。而在後 SARS 時期，中共選擇以開放性態度來與國際與國內社會進行接軌，以法律控制的方式來保證社會之下個人的安全，這是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處理方式。

同一時間，臺灣也正進行「後 SARS 時代」的改造，執政者把它搭配以「國族建構」為目的的一種動員工作，試圖以「新圍堵主義」來劃分海峽兩岸政治與軍事的對峙關係。這樣的選擇，臺灣的執政者

²³同註 21，頁 39。

把 SARS 的發生歸咎於中共蔑視人的尊嚴開始，從隱瞞疫情到忽視疫情的過程，而藉由語言 - 行動的「安全化」邏輯，一方面攻擊中共的處置方式，一方面建構兩岸隔離的「新圍堵主義」。

就前者而言，「安全化」的概念可以說是一種「存在性威脅」，國家可以根據自身的意識形態進行解釋，使得原先「非政治化」的議題，變成一種更為激進的政治化描述，從而把它變成國家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政府的決心與資源配置，或者還需要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公共安全治理體制，以採取緊急的措施。²⁴ 在這個原則下，SARS 對臺灣所引發的安全問題，是一種自我參照的實踐。也就是，臺灣把這個問題變成了一項安全事務，並作為一種相對於中共的軍事威脅之外，另一種新的「存在性威脅」而提出來。

再就後者而言，就因 SARS 被臺灣當成一種「安全化」的效用，使得執政者在不斷使用言語讓它變成「政治化」的效應之後，更採取「新圍堵主義」的行動。在各種「語言 - 行動」邏輯的建構之下，試圖對中國大陸採取比「戒急用忍」更為嚴苛的隔離措施，以做為邊界以內安全事務的主體。臺灣的這種作為，讓兩岸對安全的認知與安全的主體性產生移轉，也就是從過去軍事對峙的領域，轉移到非軍事領域的解釋方面。臺灣的這種作為，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勢必產生新的建構關係。

參、SARS 對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環境的衝擊

在 SARS 疫情緊急的這一段時間當中，SARS 從中國大陸的廣東省向全世界擴散。中共從先前的隱瞞疫情到願意接受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協助來處理疫情，標誌著中共因為病毒難以控制，不得不接受國際間的處理方式，同時協調其國內的醫療體系與國際接軌，宣導

24.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著，朱寧譯，《新安全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32-43。

SARS 的傳染途徑並改進防疫措施。

與此同時，中共正經歷兩場「不完整」(incomplete)權力交接的形式，²⁵一個是 2002 年 11 月的中共第十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另一個則是 2003 年 3 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執政者選擇優先鞏固黨與政府的領導中心，接著才處理有關於 SARS 的疫情問題。於是，SARS 對於中共的影響，在當時確曾讓人民對政府產生了「信任危機」，這就讓中共必須快速的接續在經貿領域全球化之後，必然要處理有關於全球化下病毒擴散的議題。而中共的處理模式可以視為：在國家疆界內部，以政治動員的方式來進行防疫的工作。

一、SARS 對中共政治結構的衝擊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當中，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威只有到縣的層級，實際上統治人民的權力是依靠地方的精英人物。當人民有問題的時候，所求助的是地方的精英而並不是中央政府。由於中國大陸並不存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這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毛澤東依靠群眾動員與行政命令才加以改變。

就國家政權的建設而言，中共是一個由上而下單向性與強迫性接合過程，國家只有考慮到政權的存續問題，而未曾真正考量到地方人民的需要。也因此，這種中央政策來消滅地方力量的過程，其結果反而是扼殺了社會的活動力。高度的政治動員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來達成，在高度的動員之後，社會不再擁有自主性的活力。²⁶當國家 / 政府得不到來自於社會 / 人民的刺激時，整個官僚體系就形

²⁵此處所謂的不完整所指涉的是說，胡錦濤雖已成為黨政的最高領導人，但仍不是軍隊的最高領導人。James Mulvenon, "The PLA and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Jiang Controls the Gu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5, Winter 2003, pp.20-21.

²⁶鄭永年，《朱鎔基新政：中國改革的新模式》（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9 年），頁 57-59。

成停滯／僵化的局面。按照中共過去官方的思維，如果疫情可以在中共官僚機制的控制下得到解決，那麼放任媒體報導反而會造成社會的恐慌，於是封鎖疫情與掩飾太平，就成了中共在開始時面對疫情的態度。²⁷

一般民族國家的行政範圍等同於國家的邊界。²⁸ 中共如何依靠行政力量來處理疫情？還有來自哪些非行政力量的協助？我們還需要分析在「監控式國家」之下，它們怎樣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國家接合起來。在處理 SARS 的疫情上，中共除了依靠傳統的行政力量之外，同時也自得媒體協助，讓中共在當時開放了部分的新聞自由。

而在問題的根本，對中國大陸而言，SARS 不像中共過去所面對的破壞勢力，如法輪功、分離主義分子，甚至是下崗工人等，這些問題的對象明確、影響範圍清楚，甚至集中在特定的階級群體。但是 SARS 的傳染病特性，已經擴及社會各個群體，造成群眾的普遍性憂慮。而在解決的方式上，SARS 無法單純的用武力加以對付，也不適合使用管制資訊的方式加以隱瞞，而須仰賴「有效率的行政官僚」、「資源充裕的醫療體系」、「公開詳實的訊息傳播」，這些部分卻是中共一直未建立起來的制度性架構。²⁹

二、中共對 SARS 的危機處理模式

再比較細部的來探究中共處理 SARS 疫情的模式，主要的策略可以區分為宣傳、動員與安全三個面向。³⁰

在宣傳的層次上，中共處理的第一步驟是立即撤換衛生部長張文

27. 朱建陵，〈北京觀察：革新高層遇上典型官僚，非典氾濫〉，《中國時報》，2003年4月19日。

28. 同註8，頁192。

29. 陳志柔，〈SARS 衝擊大陸政權〉，《中國時報》，2003年4月23日，版15。

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標誌著從中央層級來爭取社會大眾對於政府處置疫情的信心，並提升中共的國際形象，以及運用「三個代表」的理論與 六大精神來貫徹政府的公共權力。³¹ 第二步驟，是中共新任領導人胡錦濤探訪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如香港、廣東等地區，表示了中央與地方共同抵抗 SARS 的決心。第三步驟，是透過媒體向社會大眾說明了 SARS 的傳染途徑與如何進行預防工作，並說明中共當時的防疫成果等。第四步驟，則是提高對於 SARS 報導的自由度與透明度。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康曉光就表示，「目前大陸媒體的透明度及自由度，反應了黨政體系如何按照傳統模式動員全社會」，也就是說，如果不能號召全民共同抗擊 SARS，就不可能戰勝疫情，³² 使得從 4 月 20 日之後，中共的媒體就極力報導關於 SARS 的相關疫情與消息。

而在動員的層次方面，第一是強調依法辦事的重要性；中共把 SARS 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制法》法制傳染病進行管理，從法律上規定國家、社會與個人三方的責任與義務關係。³³ 在 1989 年制訂的傳染病防制法當中，不可能把 SARS 列為法定傳染病，自然也沒有關於新傳染病診斷、報告與公布的程序。³⁴ 另外在 5 月 9 日中共國務院頒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試圖將公共衛生事件納入法制化。

30. James Mulvenon, "The Crucible of Tragedy: SARS, the Ming 361 Accident, and Chinese Party-Army Relat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8, Fall 2003, pp.3-4.

31. 加強領導，明確責任，*《人民日報》*，2003 年 4 月 23 日，版 1。

32. 中共抗疫搬出毛式老手法，*《中國時報》*，2003 年 5 月 20 日。

33. 新華時評：依法防治非典型肺炎，*《新華社》*，2003 年 4 月 22 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10603/20030422/977958.html>>。

34. 非典型肺炎改變中國，*《人民網》*，2003 年 4 月 22 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30422/977360.html>>。

第二是成立專責單位，中央的國務院就成立防制非典指揮部，地方也成立相關的單位，如湖南成立「一把手負責制」，四川建立了疫情定期巡迴排查制度，福建省啟動了預警預報防治應急機制，山西省籌組了預防、報告、救治的「三道防線」等等，³⁵也就是透過法律來實踐行政力量。

第三，在北京的小湯山集合了北京的建設集團以及人民解放軍總後勤系統，從4月23-30日利用七天的時間建設一座「非典型肺炎定點醫院」，並在4月27日時集合了1,200名的醫護人員。這種把文革時代專守政治控制的街坊組織轉化為疫情控制組織，正是「人治式」緊急動員的寫照，表現出前現代性格的動員方式來進行抗疫。³⁶

最後在疾病安全的層次方面，第一是中共積極研究SARS的病原與醫治方法。2003年4月19日，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研究所與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進行合作，在完成非典病毒全基因測序基礎上，研制出診斷SARS的「胸聯免疫吸附檢測」（胸聯法）試劑。³⁷第二是表達了願意跟世界衛生組織，以及港澳臺共同進行防疫合作的意願，³⁸並願意在國際層面上進行廣泛的合作與溝通。

35. 抗擊非典，政府肩負哪些神聖職責？，〈《人民日報》，2003年4月28日，版5。〉

36. 疾病鏡子映照大中華面貌，〈《亞洲週刊》，2003年5月26日-6月1日，頁5。〉

37. 人民時評：靠什麼戰勝「非典」，〈《人民網》，2003年4月22日，<[http://www. 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422/977355.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422/977355.html)>。〉

38. 溫家寶提出六大防疫政策時，提到了要與港澳臺進行防疫的合作。香港輿論稱胡錦濤講話顯示中央全力助港抗疫，〈《中國新聞網》，2003年4月14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10603/20030414/971679.html>>。〉

三、國家 / 社會之間的變動關係

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形態，正由傳統國家轉型為現代型國家當中，尚不存在明確的「社會」領域。換言之，人們的社會活動還是未能跟統治者所處的國家區分開來。和傳統國家一樣，國家的行政體系只限於少數人的積極參與，政策與內部的衝突決定了權威性資源的配置，隨著國家進入全球體系當中，明確的社會領域才開始出現，傳統國家存在的價值，在於處理權威性資源的生產與分配，現代國家的任務則是管理可能的危機。

長久以來，中共處理危機的模式傾向於封閉性，但是中國大陸的社會也發展出認識真相的途徑，尤其是全球化的過程正啟動了大陸社會的自主性。例如，自從 SARS 流行以來，大陸的民眾以手機短訊（短信、短消息或簡訊）來互通消息。在中共官方有一段時間封鎖關於 SARS 的疫情下，有關 SARS 會致命的訊息，靠著手機短訊傳遍中國大陸，成了「第五媒體」，短訊變成了抗疫的利器，突破口罩與病毒的障礙。³⁹ 也就是說，使用手機的民眾，變成了一種社群，以手機為工具，目的在把「非典」的訊息傳送給朋友，⁴⁰ 凸顯對於人本身的關懷以及對於國家的不信任，也就是說，手機開始觸動人本身的自主性。

值得一提的是，SARS 也開啟了人民法制意識、公共意識的討論，主要是國家的權力與個人的權利之間的界線該如何劃分？中共的法學家鄭成良認為，個人的權利有其限度，個人權利的邊界在於不得傷害他人的權利。他呼籲對 SARS 的病人應進行強制性的隔離，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根據法律而來的行政措施與行政法規，因此是所有的公民應當遵守的原則。

³⁹ 石豔枝，「一個拇指的巨大威力」，《亞洲週刊》，2003年6月2-8日，頁26-27。

⁴⁰ 中國大陸將 SARS 簡稱為「非典」。

另外，中共的社會學家邴正也說，個人要有身為社會一分子的自覺，同時政府也要在社會與個人之間塑造公共意識，⁴¹這樣的發展，似乎已經跳脫過去國家的直接動員。它雖然不必然形成某種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雛形，但反而促成了部分中國大陸公民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SARS意外的出現，正催化北京展開變革。⁴²而且是說，當胡錦濤、溫家寶等第四代領導人想要突破第三代領導班子的陰影時，反而是這些散布在全中國大陸各地方的群眾所凝結而成的社群意識，透過網路或媒體的力量，進而讓這些群眾糾結在一起。

相對的，SARS對於大陸人民的影響，除了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脅之外，最大的影響就是大陸人民的出入境自由。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曾考慮過對美國移民當局作出任何限制中國人入境的政策建議。這樣的政策建議未曾真正實現，但是已經修改了冷戰時期對於國家的圍堵，而是採取對於人的圍堵，人流動的區隔，將影響經濟活動的開展。

在強調非傳統安全的年代，需同時審視從國家到社會再到個人的三層威脅，以及處理這三個層次威脅的行政能力。到目前為止，中共在處理國家安全的層次上，有著極佳的效率，主要是因為它擁有專斷式的控制能力，可以越過制度來達到高效率的統治方式。但是這樣的統治模式，並無法深入社會再到個人的層次，當國家跳脫以政治動員的方式將統治力深入個人時，國家無法協調社會來取得個人層次的認同，也就是無法以制度性的力量來處理非傳統的危機事件。但是全球化的進程卻讓國家／社會底層結構當中的人民開始警覺，國家存在的理由應該包含照顧人民的健康安全。

41. 防治非典：要有法律意識、公共意識，〈《人民網》，2003年5月7日，<[http://www. 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507/985828.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507/985828.html)>。

42. 疾病與輿論，催化北京變革，〈《中國時報》，2003年5月3日。

肆、SARS 對臺灣政治社會的衝擊

就疾病傳染史而言，疾病所帶來的威脅與恐懼，往往會激化社會潛藏的矛盾與衝突。⁴³這樣的情況發生在臺灣，還要再加入統獨兩股不同勢力的較勁。長久以來，臺灣在全球化的架構之下，傾向於身分認同與「國家」建構的期待。⁴⁴臺灣民主化的目的，一方面是彰顯臺灣維護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一方面是為了與中國大陸作對照比較，以實現「去中國化」的目的。而發源於中國廣東的SARS就給臺灣一個機會，也就是是否可以在民主的架構下處理疫情危機，宣傳臺灣對於人類安全的重視，就此瓦解中共在國際上的包圍等目的。

在這些目的之下，臺灣防疫的策略，主要以兩個主軸進行開展，一方面是限制兩岸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為審慎防堵疫情的擴散。也就是說，臺灣在國家疆界內部以政治語言來建立對於中共的不滿，並經由管制邊疆的方式，宣傳對於中共的「新圍堵主義」。

一、臺灣的全球化擴展戰略與挑戰

新世紀以來臺灣全球化的拓展理念，可以劃分為三個圈層。第一個圈層，是以民主化鞏固臺灣本土化的勢力，並以民主化的成果鞏固臺灣的安全；第二個圈層，是把中國大陸當作是臺灣的新邊疆，把中國大陸視為臺灣經濟的拓展地區；第三個圈層，是把全球體系當作臺灣邊疆地區，透過對於邊疆的開拓，擺脫地理上狹小空間的宿命，反而掌握臺灣本身地理區位上的優勢，擴大在國際間的生存空間。⁴⁵這套三個圈層的全球化拓展戰略，也反映出中共在國際間對於臺灣的圍

43. 李尚仁，〈防疫政治學〉，《中國時報》，2003年4月17日。

44. 同註7，頁47。

45. 同註7，頁46-52；蔡裕明，〈軍事全球化下的安全：兩岸「向左走」「向右走」的地理擴展〉，發表於2003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世局變動中的臺灣政治」學術研討會，臺灣政治學會主辦，2003年12月13日。

堵，以及臺灣尋求國際勢力來反制中共的包圍。

事實上，從李登輝時代以來，臺灣全球化路線就按照上述三個圈層進行拓展。一條是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鞏固，一條是以「戒急用忍」政策防止臺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而將整個經濟活動帶向全球，並以「兩國論」來界定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第三條路線是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李登輝曾表示，驅使他進行民主化的關鍵就是本土化，而他對於臺灣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民主化，以務實外交、元首外交、雙重承認、加入聯合國等凸顯臺灣的主權獨立，而且就是因為擁有經貿實力與民主化，臺灣在國際社會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並未被「去國家化」。⁴⁶

陳水扁上臺以後，即接續上述三個圈層希望再開展臺灣的全球進程。這樣的構想主要是拉攏美國以抗衡中共的軍事威脅，加入WTO以平衡中國大陸對臺灣經濟的「磁吸」效應，並援引國際力量保證臺灣的安全。而在對內本土鞏固的基礎上，就開始進行一連串「去殖民」運動。這個儀式的目的，除了祛除臺灣民眾心中的中國意識之外，更希望透過一系列塑造「中國威脅」的論述，進而擴大民進黨的執政版圖。於是透過「來自中國威脅」的論述，對照臺灣民主制度的鞏固，「他者」的身分正成為建構臺灣主體意識不可或缺的基礎，並經由「臺灣正名」的運動，從國家領域取得對於社會行動的解釋權，再產生新的社會控制體系。

這樣的全球拓展戰略，卻因為以下的發展反而讓臺灣有被邊緣化的危機。第一是臺灣經濟本身的弱化，朝向中國大陸傾斜的趨勢。特別是民進黨政府在經過兩年多的政治震盪期之後，再加上國內經濟指數的下滑，失業率升高，使得原本民進黨的支持者對於政府的政策趨

46. 林佳龍，〈政治領導與民主化—論李登輝的改革策略與成果〉，發表於「李登輝主政二年與臺灣的成就」研討會，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2003年5月18日，頁22-26。

於冷漠，讓政府在追求大陸政策的認同時，很難再達成一致性的共識。於是，民進黨政府只好找尋機會，持續進行國家與社會接合的解構與建構、對內與對外的論述戰爭。

在對內的解構與建構上，第一，民進黨政府利用中共對臺可能啟動戰爭威脅的恐懼，試圖建立起臺灣的主體性，用以排除中原的文化傳統。而在對外的方面，就是拉攏美國與日本來保障臺灣本身的安全。民進黨政府原本想利用這種的論述方式，以接合國家與社會對於中共的認識，卻因為兩岸間經濟的快速擴張，造成國家與社會對於中共不同的認知。

第二，是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轉向。2003年8月13日時，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表示，美國與中共目前的關係令美方「至感愉悅」，他也說，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說兩國關係為「歷來最佳」。⁴⁷美國國務卿鮑爾也指出，美國與中共間的關係，正處於數年來最佳的階段。⁴⁸這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說，美國小布希政府已經走出過去在就任之初把中共視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的角色，把中共視為一個「可以合作」的「夥伴」，在這樣的趨勢之下，美國反而會將重點放在中共。第三，中共仍然是臺灣的首要威脅，中共從以往對臺的文攻武嚇，轉而發揮「從北京到臺北最近的道路是經由華府切入」的作用。⁴⁹

由這樣的雙重發展來看，臺灣希冀從急速萎縮與破碎的兩岸關係中走出陰霾，也是藉由臺灣民主化的光環經營疆界之外的兩個地域，而是否可以有效的解決 SARS 疫情，成為臺灣是否可以成功的經營這

47. 關係歷來最佳，美中皆同意，〈《中國時報》〉，2003年8月15日。

48. Colin L. Powell, "Interview with the Washington Times Editorial Board," July 22, 2003, <<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cn/state/2003/072202.htm>>.

49. 潘錫堂，胡錦濤對臺政策不脫兩手，〈《中央日報》〉，2003年6月28日。

兩個地域的關鍵之處。

二、臺灣對 SARS 的危機處理

有關臺灣的防疫策略方面，在面對這種來自境外的傳染疾病，臺灣的處理戰略有二，其一是「境外決戰」，在國家的「邊界」即阻擋 SARS 的入侵，減少與疫區的來往，來自疫區者需進行隔離。其二是境內圍堵並殲滅「敵人」；⁵⁰而在境內的圍堵上，還要再達到「決戰境外」的考量，也就是把 SARS 疫情擋在醫院之外，不要讓其進入到急診室，這有賴於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統合各地醫療單位的協助，並建立人民良好的衛生習慣與就診模式。

再細部的來探究臺灣的防疫策略，可以見到由上而下政府的公權力的介入，也可以見到由下而上透過社群的營造來教導人民如何認識 SARS 疫情。與中共指導式的防疫策略所不同的是，臺灣受到全球化的影響較深，臺灣的人民可以從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學得讓政府對於人類安全的基本尊重，而且臺灣人民可以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將國際間的制度與規範作為評斷政府行政效率的標準。除此之外，同時接續臺灣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本土化進程，臺灣利用 SARS 疫情來凸顯對人類安全的重視。

除此之外，臺灣的防疫策略可再區分為宣傳、正名與社區參與等三個面向。

首先，在宣傳的層次上，在 SARS 未傳染到臺灣之前，臺灣極力的宣傳 SARS 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從而凸顯中共政治僵硬與缺乏基本的數字管理能力，⁵¹並向國際宣傳臺灣的「三零」政策的成效。

50. 朱樹勳，已到正規部隊應戰時刻，〈《中國時報》〉，2003年6月3日，版15。

51. 李拓梓，中國問題在數字管理，〈《中國時報》〉，2003年4月23日，版15。

其次，等到臺灣開始步入 SARS 的社區感染之後，政府開始動員，在每天的菁華時段，透過電視轉播的方式，向全國公布 SARS 最新的疫情與預防的方式，各家媒體也盡力發掘最新的消息或揭發不肖的業者趁機囤積口罩。除了電視媒體之外，網際網路也扮演了圍堵疫情擴大的角色，例如從各大搜尋引擎鍵入 SARS 等關鍵字，可以找到相關的防疫措施與關於 SARS 的資訊。除了衛生署與各地的衛生局之外，各地的政府機關、學校等，也都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並提供相觀的疫情資訊。

第三，而在 SARS 高峰期過後，中共封殺臺灣進入 WHO，臺灣開始以 WHO 的宗旨進行「安全化」的操作，即希望以全球人民獲得盡可能高水準的醫療照顧，以做為臺灣不應被 WHO 排除在外的理由，廣泛的進行國際宣傳。例如，一直到 2003 年 9 月 12 日，臺灣還在美國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社論版對頁刊出四分之一頁廣告，標題為“Say Yes to Taiwan”，廣告的內文即指出「SARS 疫情凸顯疾病不分國界，將臺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等聯合國體系之外，實欠允當，而拒絕一個經濟活躍、致力履踐聯合國憲章並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的國家，亦不合理」。⁵²

接續在國際的宣傳之後，臺灣也要求將 SARS 賦予地理上的意義，以地理的界線來進行政治的區隔。於是在正名的策略上，部分人士要求把 SARS「正名」為「中國肺炎」。對臺灣人來講，來自於中共在國際政治上的打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中共一向成為臺灣所建構「迫害圖像」的對手。使得發源於中國大陸的 SARS，希望和「德國麻疹」或「日本腦炎」一樣，要求定名為「中國肺炎」。例如學者李筱峰就說道，「病毒不分統獨，但獨派的祖國 - 臺灣，其所感染的病毒，不正是『統』派的祖國傳過來的嗎？」⁵³ 其次便是臺灣團結聯盟 (TSU) 要

52. 「搭聯合國列車」，臺灣廣告、廣播出擊，〈《中國時報》〉，2003 年 9 月 14 日，版 14。

中共提出賠償及道歉，並希望以打國際官司的方式，向國際社會表達對於中共隱瞞疫情的不滿，內地裡其實是將病毒作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從而建構「新圍堵主義」。

在強調社區參與建構心理防線上，在 SARS 肆虐期間，臺灣出現許多脫序、失序的現象，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對於 SARS 疫情的不了解所產生的恐懼。新任的衛生署署長陳建仁就說過，「無知的恐懼，會讓疫情控制缺乏機制，變成一種動亂。」因此，臺灣的防疫措施便採取，第一，以軍隊來進行疫區的消毒與隔離的工作，用來補足文官體系在危機處理整合不足的問題，並滿足民眾期待公權力貫徹的心理，從而建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⁵⁴ 第二，是建立透明與快速的通報制度。因為政府後來發現唯有透明化，才能讓臺灣的防疫工作得到控制。而在 SARS 風暴之後，臺灣在面對與「危機共存的年代」當中，有學者就提出來，政府應當透過教育單位與社區的力量，廣泛教育人民在全球化的世界當中，擁有正確的世界觀與健康的危機處理態度。⁵⁵

就這三方面來看，臺灣必然要回應 SARS 所帶來的全球化危機，尤其是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大陸所造成的安全危機。中國大陸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反而為臺灣造成新的風險。簡言之，SARS 對於臺灣新政府而言，正是整理出一個難得的政治舞臺，讓臺灣找尋對抗中共的武器。

53. 李筱峰，〈中國之疫〉，《中國時報》，2003年5月12日，版4。

54. 履彊，〈國軍進入抗疫，重建人民信心〉，《Taiwan News 新聞週刊》，2003年5月22日，頁37。

55. 化危機意識為危機共識，《Taiwan News 新聞週刊》，2003年5月22日，頁98。

三、凸顯對於人類安全的重視

在 SARS 肆虐臺灣時期，除了建立臺灣本身的防疫機制之外，還透過語言的策略來把過去國共內戰時期的宣傳手法接合在一起。衛生署的防疫文宣將 SARS 和匪諜相提並論，有些人把 SARS 認為應該正名為「中國肺炎」，是中共版的「恐怖主義」，企圖以意識形態的解釋來宣洩對於中共的不滿。

尤其是，當臺灣希望以人類安全的理念來加入全球的防疫體系時，卻遭致中共以「政治隔離」的方式，將臺灣與全球防疫體系切割。中共的這種動作所造成的結果是，臺灣認為可以利用這股人民對中共的憤怒，利用公投等議題來啟動破除對於中共虛幻的想像，以「正名」的手法來凸顯臺灣對於「中國」這個政治圖騰的抗拒，其所使用的武器就是凸顯對於人類安全的重視。

就人類安全的理念而言，「健康人權」應該是人類安全核心概念的一部分，可以做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而不應該否認人爭取較好生活條件與健康環境的權利。⁵⁶在 SARS 橫行期間，臺灣希望中共不應再以 19 世紀國家邊界的概念來審視臺灣的地位，除了關切臺灣本身的防疫手段之外，當時的衛生署長涂醒哲也提出了「決戰境外」的架構。也就是說，把臺灣本身的人才培養在外國，去幫助需要幫助的國家，如此一來既可以提升臺灣的醫療體質，也可以透過醫療幫助外國，進而推動衛生外交，盡到世界公民的責任。⁵⁷

而在 SARS 過後，臺灣所要建構的目標就是由下而上的改變傳統安全結構，讓底層的人民可以參與對社區政體的營造，政府各部門也以社區做為國家 / 社會整合的機制。⁵⁸

56. 積極因應這波全球防疫的反恐戰爭，〈《中國時報》，2003 年 3 月 18 日，版 2。〉

57. 涂醒哲：防疫是科學，不應被政治扯後腿，〈《Taiwan News 新聞週刊》，2003 年 5 月 22 日，頁 19。〉

伍、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

當兩岸都把 SARS 視為一種「恐怖主義」的時候，對抗 SARS 的工作也被視為是從事一種「非典型的戰爭」。根據西方對於戰爭的解釋，戰爭的作用是在於人的動員，一切的行動都集中於一個目的，以及由於境外的敵人的威脅，而形成國內團結的景象。因為在 20 世紀以群眾為基礎的社會當中，社群的意識，或是說社群的幻想，都是從戰爭的整合中而來。⁵⁹ 因此，重新思考兩岸面對這場「非典型的戰爭」所留下的問題，仍然可以從社群的角度來分析其中的機會與限制。

一、SARS 引發的新圍堵主義與安全化現象

當然，要以 SARS 作為對兩岸關係影響上的評估，必須重新思考事件本身的特質，以及預測結果的規模。只是，安全研究並未提供足夠的方法論，以評估這項前所未有事件的發展性。⁶⁰ 特別是，在 SARS 風暴引燃時期，其實也正上演著一場關於人的戰爭。

透過全球化的發酵、中共隱瞞 SARS 的疫情，以及對於全球化的反撲與對中共蔑視人權的一些現象，正促成臺灣新意識形態的崛起，如副總統呂秀蓮所提出的「新圍堵主義」即是。呂秀蓮認為，在 SARS 流行之時，全球有 133 個國家擔心遭到 SARS 的傳染，紛紛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採取防堵的措施；而大陸內部許多地區也因憂心 SARS 疫情的擴散，自動採取「劃地自保」的策略，這正凸顯大陸內部可能出

58. 高志文，〈後煞時代的社會重建〉，《中國時報》，2003年6月18日，版15。

59. Robert Nisbet 著，徐啟智譯，《西方社會思想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頁4。

60. Graham Allison and Andrei Kokoshin, "The New Containment: An Alliance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69, Fall 2002, pp.35-43.

現所謂「巴爾幹化」的現象。這種對中國大陸從外部到內部所產生的層層圍堵的情況，不但形成「新圍堵主義」的概念，也讓中共在 SARS 的戰爭中，首次嘗到被孤立的苦果。⁶¹

同一時間，另一種新的圍堵主義則是由中共對臺灣所發動。當臺灣表達希望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時，反而被中共以主權的理由，阻止臺灣加入全球的防疫體系，拒絕臺灣的人民有更好的健康環境與免於疾病的自由。也就是說，在後 SARS 時代，這種「新圍堵主義」的觀念，可能會以兩個層次開展：一個是對人的隔離；臺灣針對大陸人民與兩岸交流提出了限制；另一方面則是對國家的隔離；中共限制臺灣進一步以追求人類安全為目的參與全球防疫體系。雙方形成以對人的圍堵和對國家的圍堵進行「軟較量」的鬥爭，這剛好給「新圍堵主義」留下一個新的註腳。

事實上，若從傳統圍堵戰略的意義來看，過去國際間所採取的「圍堵戰略」，大多是強權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採取政治、經濟的「軟較量」手段，避免與敵對的國家直接產生衝突，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對共產集團的圍堵政策；後冷戰初期美國對中共的「新圍堵」；甚至中共對臺灣外交空間的圍堵，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圍堵戰略」。

然而，SARS 病毒挾著全球化的步伐對外擴散，各個國家或地區因擔心遭到感染，而採取類似本土化的圍堵政策，這種因病毒所引發的「新圍堵主義」，跟強權所採取的圍堵戰略，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強權所要圍堵的對象是國家，而後 SARS 時代所圍堵的對象是人。國家若被圍堵，人民還可以往來，政經文化活動不會終止。但人民若被圍堵，所有的一切將形同停滯。

面對這種可能的發展，研究全球化理論的佛萊曼(T. L. Friedman)曾提出一個「來自遠方革命」的參考架構。⁶²佛萊曼認為極權國家與全

61. 王崑義，「新圍堵主義」，《自由時報》，2003年6月3日，版4。

球體系連結起來，像是讓中國大陸與全球機構、市場進行接合，引進國際標準以及有法規為基礎的制度，可以帶動極權國家的政治改革。所以，「圍堵戰略」在全球化的時代並不見得是最好的防禦戰略。

相反的，如果中共透過社群的力量凝結為對於人類安全的新視野，反而可以建立兩岸對於人類安全的共識與定義，並建構一種「理想的言說情境」，基於彼此之間相同的認知，共同捍衛人所應具有的普世價值，從而建立非正式、非對抗、商議與共識的環境，以及多邊思考和雙邊互動等原則的交往關係。可惜的是中共並沒有採取這樣的政策，努力去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

而臺灣方面，也以「新圍堵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反制。執政者希望世界上各個國家都能了解到，中共所謂經濟發展的條件，其實是建立在壓榨農工，並以較低的價格將產品外銷到其他地域，而其背後所統治的國家權力機關，依然是一種封閉、家長式的決策方式，蔑視人的尊嚴與價值。而當 SARS 從廣東省蔓延到中國大陸其他省分與世界上其他地區時，臺灣似乎也樂見各國對中共發布的旅遊警訊與質疑中共的處理方式。而這種對於中共的「新圍堵主義」，臺灣所操作的手段，是希望所圍堵的目標是中共封閉與家長式的統治方式，圍堵的工具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警示中國大陸旅遊與貿易的可能風險，並圍堵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民。

另外，臺灣對 SARS 也採取「安全化」策略，讓 SARS 的問題擴大成國家生存的議題。於是，臺灣把 SARS 當作是「恐怖分子」看待，或是中共版的「恐怖主義」。所不同的是，SARS 是看不見的恐怖分子，並把中國大陸當作是看不見的恐怖分子的大本營。

而臺灣這種「安全化」的操作手法，一是企求將 SARS「正名」為「中國肺炎」；其次是封閉對於中國大陸的小三通，衛生署長也曾公

62. Thomas L. Friedman 著，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頁183。

開呼籲罹病臺商不要返國；第三，是強化本身的防疫體系與防護措施。當時臺灣就有人喊出要求在大陸的臺商，應該重新評估大陸投資的風險。其根本的意義就是築城，對中共築起想像的長城，這比前總統李登輝所提的「戒急用忍」政策更緊縮一步。

也就是，兩岸對 SARS 的操作，首先想到的還是國家與主權的問題，並未從人民本身的安全與否進行思考，使得 SARS 的發生，並沒有讓兩岸政府視為是一種重構關係的機會，反而變成另一種新的限制。所以可以這麼說，兩岸的政府其實並沒有在處理 SARS 疫情中，學習到開放式交往的智慧，結果 SARS 過後，好像一切並沒發生過一樣，兩岸關係依然停滯不前。

事實上，日人田中芳樹曾透過小說的描述來說明他對於國家與人的看法。他認為「國家並不是由細胞分裂而形成個人，國家是結合一群具有主觀意識的個人所構成的，在此前提下，何者為主？何者為從？在民主社會中是不辯的自明之理啊。」⁶³ 也就是說，兩岸若能重新思考「民貴君輕」的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共同以人類安全作為兩岸交流之底蘊，其實就不會產生「新圍堵主義」的現象。

畢竟，在全球化的時代需要有全球化的思考，如果能夠以人類安全作為新安全的架構，放棄以往對於安全的關注只是由國家出發，研究對於國家這想像實體的真實威脅或虛擬威脅的虛幻性。而藉由 SARS 的出現，讓大家對國家的關注轉向到對於人本身的關注，不再把人當作是政治籌碼或輕忽人民生命的價值，⁶⁴ 那麼兩岸關係的橋樑，應該可以架設起來。

63. 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說 5》（臺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64。

64. 林文程，〈中國從來不重視生命的價值〉，《自由時報》，2003 年 5 月 22 日，版 15。

二、人類安全與安全社群的建構

全球化的到來也宣告風險全球化的來臨。在風險全球化的年代，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對立或衝突，會因為新風險的出現而變得不太重要，反而是協商如何藉由合作來降低風險的擴大，並重新思考安全的意義。Wolfers認為安全與其說是種模糊的概念(ambiguous symbol)，⁶⁵還不如說是種集體想像(collective imagination)。⁶⁶在過去的時代當中，國家的安全有賴於軍隊的直接保護，而現今安全卻成為一種想像的概念(imaged concept)。⁶⁷在想像安全的建構當中，安全的概念應從維護人類安全的理念著手，開始共同建構一種安全的社群。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錯誤的資訊、誤解、錯誤的評估、錯誤的決策以及不良的溝通，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確實存在。嚇阻理論假設行為者都是理性的，但並不表示都分享相同的價值與認知結構。所有的行為者會依其本身的方式來界定其「理性化」的行為，而使得其他的行為者看起來是非理性的行動。因此，理性化並不是指雙方都擁有相似的認知結構，但也不只在決策過程中擁有不同的價值與觀點，而是指在決策過程上，理性行為者所表現對於偏好的選擇、參與目的與手段的判斷以及其他替代方案的考量等。SARS出現改變了以往以軍事安全做為國家安全的主體與政策。以往國家安全的目標是以對方的軍事武裝力量為主要的計畫，現今以單純的傳統安全劃分的方式儼然不適用。

65.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in Arnold Wolfers, ed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47-165.

66. 「集體想像」所指涉的是一群相互不認識或未曾謀面的人們，藉由共同的想像將其連結在一起，從而對某種理念、理想或共同體產生歸屬感。請見Tim Jordan, *op.cit.*, p.179。

67. 曼谷非典峰會的新契機，〈《亞洲週刊》〉，2003年5月5-11日，頁5。

當然，兩岸之間若以人類安全的理念開始共同建構安全的社群，可以做到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領導者之間正式與非正式的接觸；第二，建構出一種文化上的相似性；第三，兩岸之間所建立的規範、原則，這些規範或原則被兩岸的成員所認同並接受；第四，兩岸之間未來可以發展一套互動與社會化的過程，彼此之間相互妥協並彈性的調整政策。

畢竟，以往兩岸之間的軍事對峙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國家互動、對話改變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割裂對各方認為他必須對另一方的軍事部署所做出的回應，或超越部署等。所以一旦協調的制度性文化建立之後，經由互動與社會化的過程，得以減少國家因為國家安全的理由，而對另外一個國家祭出軍事威脅的大轟。

不可避免的，SARS 的出現，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後 SARS 時代兩岸關係的基本架構。期待兩岸能以人類安全的概念，讓傳統以國家做為安全論述的主體邊緣化，回到一個以人為安全思考的主軸。這對在兩岸之間建立起新的安全社群，或許會有正面的效用。

陸、結論

在「911 事件」之後，全球各國政府與國際社會遭逢來自恐怖主義的全球性安全威脅；另一方面，SARS 或 HIV/AIDS、以及在 2004 年初引發東亞新風暴的「禽流感」之類的流行病，已經成為人類安全威脅的另外一個部分。特別是 SARS 與禽流感兩種以東亞地區為範圍的流行病，更是成為在 21 世紀當中東亞各國所需面對的安全議題，這是因為 SARS、禽流感之類的流行病，也將同步影響到軍事組織、國家經濟、糧食供給與社會安全的各種面向。也就是說，在風險全球化的年代，我們需要更好的疾病監督機制，以及隨時評估再有類似疫情爆發的處置方式，這樣的機制包含分析與審視國家內部關於公共衛生的醫療訊息，也時刻要注意國家外部的公共衛生或醫療危機所造成的公共安全議題。

在疾病風險日增的年代，一個國家不可能以鎖國的方式拒絕與國際社會往來。因此，一旦流行病的出現，採取透明、緊急應變、擴大合作等方式，才是面對疫情的有效途徑。例如，2003年5月東協所舉行的「加一」特別高峰會，以及2004年初在泰國舉行的禽流感跨國防治會議，即是一個較佳的疾病跨國合作防治的模式。⁶⁸

但是東協「加一」的跨國疫情合作，想要在兩岸出現，恐怕很難見到。關鍵點在於，兩岸所有的非政治議題都可能被安全化。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是從國家這個層次思考安全，讓臺灣也不得不從國家層次來思考安全問題，這就不利於兩岸的合作關係。如果雙方能夠回歸到以人為主體的安全觀，強調人本身所應具備免於威脅與恐懼的權利，透過兩岸各自所形成的社群進行合作，以人類安全作為共同的目標，形成超越疆界的合作關係，讓人類安全的概念，作為一種「超現代」的想像與超越政治與軍事建構的產物，那麼兩岸才能回歸到良性互動的情境。

因此，兩岸應該可以嘗試凸顯對人類安全的關注，以作為共同安全合作的起點。在這個意義上，兩岸可以建立包含社會各社群的回應機制，這類的社群可以超越兩岸無形的疆界，其中包括國家領導人的參與，增加國際援助的可能。透過這種人類安全的回應機制，才有可能拉近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

(收件：2003年11月13日，修正：2004年2月8日，採用：2004年4月9日)

68. 從抗疫解讀未來兩岸關係，〈《亞洲週刊》〉，2003年5月12-18日，頁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王崑義，2001。《全球化與臺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臺北：創世文化。
- 王逸舟編，1999。《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田中芳樹，1994。《銀河英雄傳說 5》。臺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 紀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2002。《民族、國家與暴力》。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
- 陸忠偉編，2003。《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
- 鄭永年，1999。《朱鎔基新政：中國改革的新模式》。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 鄭祥福，1996。《後現代政治意識》。臺北：揚智文化公司。
-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著，朱寧譯，2003。《新安全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Robert Nisbet 著，徐啟智譯，1991。《西方社會思想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 Charles J. Fox and Hugh T. Miller 著，楚豔紅等譯，2002。《後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David Held 等著，沈宗瑞等譯，2001。《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臺北：韋伯文化出版社。
- S. Best and D. Kellner 著，張志斌譯，2001。《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Postmodern Theory*)》。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Thomas L. Friedman 著，蔡繼光等譯，2000。《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期刊論文

- 林佳龍，2003/5/18。 政治領導與民主化—論李登輝的改革策略與成果 ，發表於「李登輝主政 二年與臺灣的成就」研討會，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頁 22-26。
- 林碧炤，2001/9/14。 全球化與人類安全 ，發表於「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
- 莫大華，1998/8。 安全研究論戰的評析 ，《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8 期，頁 19-33。
- 蔡裕明，2003/12/13。 軍事全球化下的安全：兩岸「向左走」「向右走」的地理擴展 ，發表於「2003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世局變動中的臺灣政治」學術研討會，臺灣政治學會主辦。
- 蔡裕明，2001。 資訊性民族主義—Linux 對中國大陸的意義 ，《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12 期，頁 21-36。
- 蔡裕明，2003/11/21。 想像的 Open Source 社群 - - Linux 在臺灣的發展經驗評述 ，發表於 2003 年「臺灣的社區與組織」研討會，國立中山大中山學術研究所主辦。

雜誌

- 2003/5/5-11。 曼谷非典峰會的新契機 ，《亞洲週刊》，頁 5。
- 2003/5/12-18。 從抗疫解讀未來兩岸關係 ，《亞洲週刊》，頁 5。
- 2003/5/22。 化危機意識為危機共識 ，《Taiwan News 新聞週刊》，頁 98。
- 2003/5/22。 涂醒哲：防疫是科學，不應被政治扯後腿 ，《Taiwan News 新聞週刊》，頁 19。
- 2003/5/26-6/1。 疾病鏡子映照大中華面貌 ，《亞洲週刊》，頁 5。
- 石豔枝，2003/6/2-8。 一個拇指的巨大威力 ，《亞洲週刊》，頁 26-27。

履疆，2003/5/22。 國軍進入抗疫，重建人民信心 ，《Taiwan News 新聞週刊》，頁 37。

報紙

- 2003/3/18。 積極因應這波全球防疫的反恐戰爭 ，《中國時報》，版 2。
- 2003/4/23。 加強領導，明確責任 ，《人民日報》，版 1。
- 2003/4/28。 抗擊非典，政府肩負哪些神聖職責？ ，《人民日報》，版 5。
- 2003/5/3。 疾病與輿論，催化北京變革 ，《中國時報》。
- 2003/5/20。 中共抗疫搬出毛式老手法 ，《中國時報》。
- 2003/8/15。 關係歷來最佳，美中皆同意 ，《中國時報》。
- 2003/9/14。 「搭聯合國列車」，臺灣廣告、廣播出擊 ，《中國時報》，版 14。
- 王崑義，2003/6/3。 新圍堵主義 ，《自由時報》，版 4。
- 李尚仁，2003/4/17。 防疫政治學 ，《中國時報》。
- 李拓梓，2003/4/23。 中國問題在數字管理 ，《中國時報》，版 15。
- 李筱峰，2003/5/12。 中國之疫 ，《中國時報》，版 4。
- 朱建陵，2003/4/19。 北京觀察：革新高層遇上典型官僚，非典氾濫 ，《中國時報》。
- 林文程，2003/5/22。 中國從來不重視生命的價值 ，《自由時報》，版 15。
- 朱樹勳，2003/6/3。 已到正規部隊應戰時刻 ，《中國時報》，版 15。
- 陳志柔，2003/4/23。 SARS 衝擊大陸政權 ，《中國時報》，版 15。
- 高志文，2003/6/18。 後煞時代的社會重建 ，《中國時報》，版 15。

潘錫堂，2003/6/28。 胡錦濤對臺政策不脫兩手 ，《中央日報》。
嚴震，2003/9/11。 911 改變了美國固有價值 ，《中國時報》，版
15。

網際網路

2003/4/14。 香港輿論稱胡錦濤講話顯示中央全力助港抗疫 ，《中
國新聞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
10603/20030414/971679.html](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10603/20030414/971679.html)>。

2003/4/22。 非典型肺炎改變中國 ，《人民網》，<[http://www.pe-
ople.com.cn/GB/guandian/30/20030422/977360.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30422/977360.html)>。

2003/4/22。 人民時評：靠什麼戰勝「非典」 ，《人民網》，<[http://
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422/977355.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422/977355.html)>。

2003/4/22。 新華時評：依法防治非典型肺炎 ，《新華社》，<[http://
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10603/20030422/977958.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12/10548/10603/20030422/977958.html)>。

2003/5/7。 防治非典：要有法律意識、公共意識 ，《人民網》，<
[http://www. 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507/985828.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30507/985828.html)>。

英文部分

專書

Jordan, Tim, 2001.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hmae, Kenichi,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 Econom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heingold, Howard,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Snow, Donald M., 1995.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Policy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Wolfers, Arnold, eds., 1962.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47-165.

期刊論文

Fall 2002. "Human Security: A Conversation," *Social Research*, Vol.69, No.3, pp.659-661.

Allison, Graham and Andrei Kokoshin, Fall 2002. "The New Containment: An Alliance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69, pp.35-43.

網際網路

Mulvenon, James, Fall 2003. "The Crucible of Tragedy: SARS, the Ming 361 Accident, and Chinese Party-Army Relat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8.

Mulvenon, James, Winter 2003. "The PLA and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Jiang Controls the Gu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5.

Powell, Colin L., 2003/7/22. "Interview with The Washington Times Editorial Board," <<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cn/state/2003/072202.htm>>.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http://www.undp.org/hdro/hdrs/1994/english/94.htm>>, Chapter 2.

Globalization, Human Security and the Post-SARS Er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Kung-yi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Yuh-ming Tsai

(Ph.D. Candida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at Sun Ye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as also aroused the risky-globalized-impact. The outbreak of SARS upsets the global optimismists a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Moreover, the security studies community now emphasizes the human security that was used to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human security by which was threatened SARS, then analyzes the new Cross-Strait relations after the SARS era and express our opinions about the futur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aiwan's case, SARS was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came beyond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however, in China's case SARS was the dangerous security challenge of indigenous disease. Therefore, Taiwan and China have separately impelled different disease control management and reconstruct the definition of security by their own situation.

This article concluded that as the nations effectuate global enlargement strategy based on human security, the two states would construct the common value and consensus of human security more easily. In other words, the Cross-Strait dialogue could construct “ideal type” democratic societies based on the common interest in human security and dignity.

Keywords: SARS, Human Secur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Border/Frontier, Globalization

